

若封杀俄罗斯,是重蹈“政治干预体育”覆辙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再有两周,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就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都为之付出了四年的汗水与等待。然而,近期不断发酵的兴奋剂风波,可能导致奥运会主角之一俄罗斯运动队无缘里约奥运会。纵观整个事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魅影,似已突破了体育的边界。

7月18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在加拿大多伦多发布报告,称俄罗斯体育部和安全部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协助俄罗斯运动员大规模使用兴奋剂,并在兴奋剂检测中为这一行为进行掩盖。21

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瑞士洛桑公布裁决,驳回俄罗斯奥委会、俄罗斯田联及68名田径运动员的相关请求,维持国际田联2015年11月对俄罗斯实行全面禁赛并取消俄罗斯田协成员资格的决定,这意味着这68名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希望渺茫。

至于俄罗斯运动队能否参加里约奥运会,还要看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国际奥委会称,上述调查报告和裁决结果将作为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的重要参考。而在俄罗斯看来,上述报告和裁决已经超出体育的边界,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是西方国家打压俄罗斯的又一例证。

那么,原本一起体育圈的反兴奋剂事件,怎么就变成了整个俄罗斯代表团的禁赛危机,并升级为西方打压俄罗斯的政治角力呢?

2014年12月初,一家德国电视台播出一部纪录片,揭出俄罗斯田协界存在系统性使用

兴奋剂行为,其中国际田联的贪腐成了产生该结果的温床。随后,国际奥委会、国际田联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相继展开调查,时任俄罗斯田协主席巴拉赫尼切夫宣布辞职。2015年11月,国际田联最终决定对俄罗斯实行全面禁赛。

最终将兴奋剂丑闻提升到国家政治层面的,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几天前公布的那份调查报告,它将矛头扩展至整个俄罗斯运动队,直指俄政府相关部门深度牵涉其中。在报告公布前,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西班牙、瑞士等10国反兴奋剂组织及20多个体育团体还草拟了一封给国际奥委会的联名信,呼吁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

至此,美国的身影出现了。伴随着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一步步发酵升级的,是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正是这一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开始对峙和对抗。也正因这

一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是以各种形式抵制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接着,欧盟又明确表示,考虑是否建议停止俄罗斯参与包括一级方程式赛车、欧洲足球联赛和将由俄罗斯主办的2018年世界杯在内的“高规格国际文体活动”,以便更加有效地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由此可见,俄罗斯指责西方国家借题发挥,将体育领域个别运动员的违禁行为上纲上线到整个俄罗斯运动队,称之为对俄的泛政治化制裁并非没有道理。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调查报告公布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体育已被政治“割裂”,称艰苦训练的运动员不应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还提到了奥林匹克历史上最严重的抗议——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事件。

由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由美国牵头,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肯尼亚、菲律宾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抵制了

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中国也未参加这届奥运会。作为报复,四年后苏联又联合15个国家抵制了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时至今日,虽然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渐退,但以地缘政治博弈为基调的对峙并未减少,反而在近年来愈演愈烈,以至于有关“新冷战”袭来的论调不绝于耳。出现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呼声,意味着当今俄与西方的政治军事对立已经延伸到了体育领域,一旦俄罗斯被禁止参赛,无疑将导致双方的对抗全面化,留给彼此对话和缓和关系的余地会更小。

如果没有俄罗斯这个体育大国的参与,里约奥运会的精彩程度和关注度必将大打折扣。现在,无论是俄罗斯、美国,还是国际奥委会,都站在了危险的边缘,会否重蹈当年“政治干预体育”的覆辙,就看国际奥委会的决定了。

“口袋妖怪”,让全世界都上了瘾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要说七月最火的游戏,当数“口袋妖怪Go”(又名“精灵宝可梦Go”)了。这款由著名游戏公司任天堂、Pokémon公司和谷歌Niantic Labs公司联合制作开发的手机游戏,自从7月7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区域首发以来,很快风靡全球,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窝蜂地入了这个手游的“坑”。

在手游的主力玩家“80后”、“90后”甚至“00后”中,恐怕很少有人没看过以皮卡丘和它的主人小智为主角的那部动画片——《神奇宝贝》(又名《宠物小精灵》、《精灵宝可梦》)。会用“十万伏特”技能的皮卡丘,会喷水的杰尼龟,背上有两根长藤的妙蛙种子,喜欢唱歌的胖丁,这些熟悉的“口袋妖怪”名字,是很



12日,几名玩家在美国迈阿密的一座公园内玩手机游戏“口袋妖怪Go”。

多年轻人的童年回忆。

十几年前,不知道多少等在电视机前看《神奇宝贝》的孩子,希望自己也能像小智一样,拥有一只会卖萌、会放电的皮卡丘。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们,终于可以通过这款游戏实现儿时的梦想。游戏发布后不久,下载量就蹿升至苹果手机应用排行榜榜首,在安卓手机应用商店目前已被下载了超过1000万次。

“口袋妖怪Go”采用增强

现实(AR)技术,玩家打开手机上的游戏APP,启用地图和定位功能,就能在摄像头实时拍摄的画面中寻找“口袋妖怪”所在的位置,再进行捕捉。游戏上所显示的地图是跟现实世界关联的,也就是说,皮卡丘等“口袋妖怪”可能出现在任何范围内,玩家很多时候要走到大街上、户外或其他建筑物内,才能找到并捕获一只“口袋妖怪”。因此,游戏首发后,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成群的年轻人跑到大街上,盯着手机满世界抓“口袋妖怪”,有人甚至跑到别人的院子里、警察局里,还有位男士跑进了女厕所,口口声声喊着:“我是来抓‘口袋妖怪’的!”

这些行为看起来已经很有趣了,但还有更“魔怔”的。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子爬到了公墓里的一棵树上抓“口袋妖怪”,结果却下不来了,最后拨打了“911”才获救。一名法国男子为了抓“口袋妖怪”,闯入了印尼的一处军事基地,被警方拘留了好几个小时。还有一个24岁的新西兰小伙,为了游戏连工作都不要了,他辞掉了在咖啡厅的工作,走遍整个新西兰去抓“口袋妖怪”,立志要把总共151种“口袋妖怪”全部抓到手。他的母亲竟然非常支持:“虽然我不懂这游戏,但看到他享受生活,我百分之百支持!”

上个星期,“口袋妖怪Go”相继登陆欧洲国家,包括6月末刚宣布“脱欧”的英国,但法国

却被迫“脱欧”了一次。由于7月14日发生的尼斯恐袭,法国方面宣布把该游戏的上线时间推迟。到现在,翘首以待的法国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玩上这款游戏。

游戏如此火爆,任天堂公司当然也是赚翻了——该公司股价19日飙升约14%,盘中一度创下六年三个月以来的新高,随着赞助商纷至沓来,任天堂的“钱途”不可限量。还有脑子活络的人看到了商机:有咖啡馆、快餐店贴出了“欢迎来抓‘口袋妖怪’”的招牌;有司机向玩家提供包车服务,专载他们到有“口袋妖怪”的地点;华纳公司等电影大亨则希望能把这款游戏拍成电影。一个游戏,已经带起了一轮席卷全球的经济浪潮。

遗憾的是,因为“口袋妖怪Go”是基于谷歌地图进行游戏的,所以这款让全世界都上瘾的游戏现在还没法在中国玩。如果它能在“解锁”,估计早就跃跃欲试的中国玩家,又要挤爆一次服务器了。

“西亚病夫”的另一种“自强史”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莹

与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同病相怜,土耳其在近代史上曾被称为“西亚病夫”,只不过,这位“病友”当年的病势更加危重一些:不仅手脚不灵便,打不过西方列强,眼神也不太好使,老是站错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居然不顾自己国势羸弱,毅然为同盟国站台(原因仅仅是德国送了他家一艘战列舰)。无论怎么看,这一选择都称得上是作死行为,要知道,作为一个腐败的旧政权,奥斯曼土耳其原本19世纪就该亡国了,只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要玩大陆制衡,才留

了它一条命。如今土耳其又得罪了恩主英国,没人罩着了,协约国一方把几百年前的民族仇、宗教恨都翻出来了,誓要把土耳其打得灭国才罢休。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前,突然晴天霹雳一声响,上天给土耳其降下了一个救国军神,这就是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完美的”,土耳其人后来还给他专门授予了个姓氏叫“阿塔土克”,意思是“土耳其人之父”。一个人牛到敢叫“完美的爹”,你可以想象他战斗力有多爆表。一战期间,当土耳其在其他各条战线节节败退时,唯独凯末尔任师长的那个师捷报频传,两次打退了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登陆。凯末尔因此一战成名,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英雄。

当然,凯末尔之所以能取

得完胜,除了他本人天纵文武之外,跟英国人不会玩登陆战也有很大关系。策划该战的海军大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丘吉尔,这位记者出身、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青”大臣估计是文学经典看多了,执意要求英军在武器装备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模仿古人在小亚细亚登陆。想法很浪漫,但战果却是被凯末尔手中刚进口的德国水冷马克沁重机枪怒收一拨人头。参与此战的英军澳新军团因为伤亡过于惨重,回国后就将此战日期定作了本国的建军节。

凯末尔虽然仗打得漂亮,但也因此跟协约国结了仇。1919年,在摆平了德奥之后,英法转过头就开始琢磨怎么收拾土耳其。但考虑到一战刚打完,本国士兵都想歇歇,于是决定出钱出枪出顾问,怂恿希腊跟

土耳其开干。希腊在老大哥的忽悠下,不顾自家还欠着一屁股战争债,兴冲冲地去找土耳其打仗,随即被已荣任土耳其共和国统帅的战神凯末尔干翻在地,连希腊总司令都被活捉了。

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与土耳其正式签订《洛桑条约》,以条约形式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在欧洲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一个与基督教文明“异质”的民族争取到生存权,这是个超高难度的工作,但凯末尔居然完成了。

如果同样以1919年为界,曾是“东亚病夫”的中国用30年才完成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西亚病夫”土耳其却只用了四年就翻身得解放。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痛快”得多的民族解放史,但正是因为其“速胜”,土耳其的病其实没好利索,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首先,土耳其对近代化、世俗化的理解没有深化,崇尚、向往世俗化的始终只有少部分城市精英,至于广大农民则始终没有摆脱宗教和封建制度的影响,这造成了土耳其建国后宗教和封建势力的一再反扑。为了制衡这种反扑,土耳其不得不加强凯末尔时代就留下的军人干政传统,这造就了土耳其军队喜欢改变的“光荣传统”。最严重的后遗症,其实还不是这些。由于凯末尔的“救国英雄”形象太过耀眼,导致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却形成了一种民主制度下罕见的“英雄情结”,政治家在演讲时言必称凯末尔,民众也始终幻想某个政治强人能帮国家解决困境。这种“英雄幻想”,其实是凯末尔革命给土耳其留下的最大病根,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它会一再发作。